

费孝通的 买办社会学批判

李 达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40.18
59

費孝通的买办社会学批判

李 达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年

內 容 提 要

本書首先追溯了資產階級社會學的源流，指出資產階級社會學各派都是為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服務的說教，它們是沒有絲毫科學氣味的；費孝通的社會學更是買辦社會學，資產階級右派要恢復資產階級社會學的目的就是要推翻社會主義復辟資本主義。這是一本很有現實意義的著作。

費孝通的買辦社會學批判

李 達 著

*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紹興路54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01號

上海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

開本 787×1092 公厘 1/32 印張 7/8 字數 17,000

1968年5月第1版

196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0,000

統一書號：3074·163

定 價：(7) 0.10 元

封面設計：任 意

在章罗联盟中，以費孝通为首的一批右派知識分子，为了执行他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綱領，公开叫囂要恢复資产階級社会学。因此，費孝通約集了陈达、吳景超、李景汉等人，成立了“社会学工作委員會”，并且計劃着要先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的高等学校成立“社会学系”。他們妄想以中央民族学院、人民大学和劳动干部学校作为他們活动的基地。他們还計劃着搜罗資产階級社会学的“学界同人”，成立“中国社会学会”，扩大他們的队伍。費孝通等这一切恢复資产階級社会学的活动，并不是單純地为了恢复資产階級社会学，而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阴謀，其目的是企图用腐朽的反动的資产階級社会学来反对馬克思主义，特别是反对历史唯物主义，第一步夺取学术思想界的領導权，第二步夺取全国的領導权，来实现章罗联盟的反动的政治綱領，使資本主义在中国复辟。

費孝通等恢复資产階級社会学的政治阴謀，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几次座談会上，已由許多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根据許多无可爭辯的事实，尽情地予以揭露和批判，我这篇文章，主要地是檢查費孝通的資产階級社会学究竟是什么东西？它是不是科学？它为什么階級服务？它对于我們社会主义国家有什么危害性？

在以前，我不曾看过費孝通所写的社会学著作。最近看到

他把資產階級社會學誇張比歷史唯物主義還要高明，我這才搜集他在解放前後所寫的幾本主要著作，如“鄉土中國”、“鄉土重建”、“重訪江村”和幾篇論文以及報端所揭載的關於他的某些著作摘要等，拿來研究了一番。我所得的結論是：費孝通的社會學是另一種資產階級社會學的流派，是中國的一種資產階級的社會學。費孝通的這種資產階級社會學雖然帶有中國味，但它和歐美各國資產階級社會學在根本上是相同的，并且还繼承了它的先輩的衣鉢。因此，在批判費孝通的社會學之前，有追溯資產階級社會學的源流的必要。

—

資產階級社會學的創始人是法國人孔德。孔德是實證主義（即主觀唯心主義）哲學家，他根據實證主義的觀點，認為觀念是全部社會結構的基礎，用知識發達的歷史來說明社會發達的歷史。他把知識發達的歷史劃分為神學的、形而上學的及實證的三個階段；把現實的歷史劃分為軍事的、法治的及產業的三個階段。他認為知識的實證階段是知識發達的最高階段，即是資產階級知識的階段；歷史的產業階段是歷史發達的最高階段，即是資產階級社會的階段。因此，他主張資產階級社會是合乎理性的，是最進步的。其次，十九世紀初期的法國資產階級已經掌握了政權，但它一方面要向封建的殘余勢力作鬥爭，一方面又要鎮壓無產階級的反抗。因此，它認為鞏固資產階級社會的秩序是極端必要的。孔德所以把他的社會學叫做“人類社會的秩序與進步的科學”。所謂“秩序”即是資產階級社會的秩序，所謂“進步”是暗示資產階級社會是最進步

的社会。所以孔德的社会学的任务是在于拥护資本主义的秩序而反对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

十九世纪中叶，无产阶级已经登上政治斗争的舞台，这对于資本主义是一个致命的威胁，于是资产阶级社会学者就制造了拥护資本主义秩序的新理论来麻痹无产阶级。这种新理论就是斯宾塞的生物学主义的社会学，即是社会有机体学说。斯宾塞继承孔德的社会有机体的见解，加以扩展，把人类社会比拟为动物有机体，把社会的阶级分化比拟为动物有机体的机能的分化。动物有机体有调节系统，这与資本主义社会的支配者资产阶级相当；有履行营养职能的系统，这与工人和农民的阶级相当；有分配器官系统，这与商人相当。营养、分配、支配这三个系统互生作用，维持生命的发展。所以社会的生命受生物学的进化的规律所支配，社会之分为统治与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的阶级，是合乎自然的规律的。因此，斯宾塞认为資本主义社会是没有内在矛盾的、最和谐的社会制度，从这里就引出了反对阶级斗争主张阶级调和的改良主义结论。

生物学主义社会学的两个流派，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人种学派的社会学。社会达尔文主义把达尔文学说作恶意的解释，把生存竞争、自然淘汰及适者生存等进化论的范畴运用于人类社会，借以证明资产阶级社会中的斗争和竞争的必然性。依据这种学说，社会群斗争的结果，必然是优胜劣败，弱肉强食；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帝国主义对于弱小民族的统治与剥削是合乎自然的规律的。人种学派的社会学，把人种或民族当作历史的根本要素，把人种或民族间的斗争看做历史进

化的原动力。这一学说，研究人种或民族的特点，把人类分为黑色、黄色、白色三人种。这三色人种之中，白色人种是文化的創造者，其他各色人种，人种的价值很少。至于劳动阶级在人种上说来，是变质者，是下等人。因此，世界上只有純粹的白色人种是世界的主宰，其他有色人种及变质的或混血的白种，都是純白色人种的奴隶，应当受到統治与剝削。这显然是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露骨的宣傳，是法西斯主义的厚顏无耻的說教。

帝国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社会学的一个主要潮流，是心理学派的社会学。这种社会学是法国人达尔德所首創，美国的吉丁斯、华德、罗斯、貝尔納德等是这一派的代表。这种社会学主張社会是由人們的心理相互作用构成的。这种心理的相互作用即是社会学的对象。它把心理发达的程序看做社会发达的程序，因而主張知識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达尔德提出了所謂“模仿說”，主張社会生活完全受人类的模仿的本能所支配。杰出的人物具有高級的心理和智慧，他的一举一动都为那些具有低級心理的人民群众所仿效，把它推广到社会生活中去。所以杰出人物对于社会生活有首創精神，广大的人民群众只是执行杰出人物的意志，在社会中不起任何作用。吉丁斯等也說統治阶级是具有高級形式的意識的集团，所以有权在社会上起领导作用。他們甚至无耻地宣称美国人都是具有高級心理的人，所以美国能够統治全世界。这簡直是宣傳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口号。这种心理学的社会学也还有另一方面的作用。既然认为社会是心理的相互作用，认为知識是社会发达的动力，就必然引出这样的結論：要改良社会，必先

改造人心；要改造人心，必須依賴于教育。至于执行教育权的人們必然是属于具有高級的心理或知識的統治階級即資產階級，那些接受教育的人們就属于只具有低級心理的无产階級和劳动大众了。由此可知，心理学派的社会学，又是針對帝国主义时代階級斗争的实况，提倡心理改良主义，借以緩和階級斗争而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東西。属于心理学派社会学的，还有德国人齐美尔所創造的形式社会学。

此外还有地理学派的社会学，宣傳馬尔薩斯人口論的社会学。都是維護資本主义反对无产階級革命的。

以上是資產階級社会学的几个主要流派，其他的支流支派还有很多，花样翻新，不一而足。所以資產階級的各派社会学者中，常常互相爭吵，各人总是主張自己一派的社会学是科学的社会学。为什么他們也互相爭吵呢？主要的原因是由于資產階級社会学的各派，始終沒有找到自己的研究对象。例如孔德和斯宾塞的社会学被他們的后輩加上“百科辞典的社会学”的綽号，因为这类社会学把一切的社会現象作为研究对象，显然是把各种社会科学所研究的各种社会現象都拉致在社会学研究領域作綜合研究的。事实上，这样的綜合研究是沒有必要的。这样說来，資產階級社会学究竟研究什么东西呢？社会的經濟現象、政治現象和思想現象既然都有个别的專門科学去研究，那么，社会学究竟研究什么呢？研究对象沒有了，社会学只剩下一块空招牌，这是資產階級社会学的危机。資產階級社会学者們为了克服这种危机，就异想天开，找寻各种社会科学所不研究的東西作为社会学的对象。这样一来，各种奇形怪状的社会学出現了，什么文化社会学、知識社

社会学、宗教社会学、亲族社会学、法律社会学、民族社会学、乡村社会学、都市社会学、社会調查的社会学、社会問題的社会学等等，都接二連三地出現了，最近还出現了宣傳原子詭詐的“原子社会学”。在資產階級社会学者說來，凡是研究任何社会現象的一小部分的東西都可以稱做社会学。社会学变成了百行百业公用的招牌。这真是可怜可笑的社会学！

但是，資產階級社会学的派別不論如何复杂，它們都有下述几个共通之点：

1. 它們都是唯心主义的社会觀，用社会意識說明社会存在，一切从主觀愿望出发。

2. 害怕社会发展的客觀規律，因而否認它，企图証明資本主义制度是万古长存的。

3. 反对馬克思主义，特别是反对历史唯物主义。

4. 反对无产階級革命，宣傳改良主义，企图麻痹无产劳动大众的革命的斗志。

5. 为資產階級对于无产階級的統治和剝削作辯护。

6. 为帝国主义的世界政策和侵略政策制造理論的根据，甚至公开宣傳法西斯恐怖主义，为战争販子作帮凶。

由此可見，資產階級各派社会学，都是为帝国主义、資產階級服务的說教，它們是沒有絲毫科学气味的，費孝通等人要在我們社会主义国家恢复資產階級社会学，他們的动机不是反革命又是什么呢？

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是关于社会及其发展的客觀規律的科学，是科学的社会觀和方法的統一的科学，是社会的理論与社会的實踐的統一的科学。各国共产党只有根据社会发展規

律并結合本国社会的特点，制訂正确的革命和建設的理論和政策，才能領導工人階級和人民群眾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勝利，才能推进社会主义的建設。苏联的經驗、中国的經驗、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經驗都証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眞理性。

二

現在，我們來檢查費孝通的“中国社会学”。

費孝通自己說，他是在大学里教乡村社会学的，最初他采用“美国的教本”，后来“覺得不愜意”，又曾用他自己調查的材料講，決定另起炉灶，专从中国社会結構本身着手。他說，他在社会学門內的工作，分为两期：“第一期工作是实地的社区研究”，即是到中国乡村实行社会調查；“第二期工作是社会結構的分析，偏于通論性質，在理論上總結并開導实地研究。”他說他是選擇这样的方向來“发展中国的社会学”的。依照他的方向是先做乡村調查，然后來分析中国的社会結構。但是我在这里檢查費孝通的“中国社会学”的順序，却先要檢查他的中国社会結構論，然后檢查他的社会調查的目的和內容。

費孝通的中国社会結構論，表达在他所写的“中国社会变迁中的文化症結”（他在1947年在倫敦經濟学院的講演稿）和其它几篇小論文（如“差序格局”、“系維着私人的道德”、“家族”、“男女有别”、“礼治秩序”等）之中。依据費孝通的說法，中国的社会結構是孔子給“規画”出来的。这以社会为個人，以人倫为本位，以亲属关系为基础。他說：「我們儒學最考究的是人倫，倫是什么呢？我的解釋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輪輪波瀾的『差序』」。

又說：“倫重在分別，在礼記祭統里所講的十倫，鬼神、君臣、父子、貴賤、親疏、爵賞、夫婦、政事、長幼、上下，都是指差等。不失其倫，是在別父子、遠近、親疏。倫是有差等的次序”。又說：“儒家注重倫常，有它的社會背景。中國傳統社會結構的基礎是親屬關係。親屬關係供給了顯明的社會身分的基圖，夫婦、父子間的分工合作是人類生存和綿續的基本功能所必需的，……而且以婚姻和生育所結成的關係，一表三千里，從家庭這個起點，可以擴張成一個很大的範圍。……在儒家的社會結構中，親屬也總是一個主要的綱目，甚至可以說是一切社會關係的模範。”他還在“差序格局”中說明“從生育和婚姻所結成的網絡，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無窮的人，過去的、現在的和未來的人物。……這個網絡象個蜘蛛的網，有一個中心，就是自己。”他說：這個己是“推己及人的己，對於這己，得加以克服於禮，克己就是修身，順着這同心圓的倫常，就可以向外推了。……從己到家，由家到國，由國到天下，是一條通路。中庸里把五倫作為天下之大道。因為在這種社會結構里，從己到天下，是一圈一圈推出去的。”綜合費孝通的見解，中國社會結構的基礎，就是以人倫為本位的親屬關係的總和。

其次，中國社會的秩序是靠什麼維持呢？費孝通認為中國社會秩序的維持，不是依靠人治，也不是依靠法治，而是依靠禮治。據他說，這種社會的秩序是“禮治秩序”，這種社會即是“禮治社會”。他解釋“禮是社會公認合式的行為規範”，而“維持禮這種規範的是傳統”。“所謂禮治是對傳統規則的服膺。生活各方面，人和人的關係，都有着一定的規則。行為者對於這些規則從小就熟習，不問理由而認為是當然的。長期

的教育已把外在的規則化成了內在的習慣。維持禮俗的權力不在身外的權力，而是由身內的良心。所以這種秩序注重修身，注重克己。理想的禮治，是每個人都自動的守規矩，不必有外在的監督”。據說“禮治的可能必須以傳統可以有有效的應付生活問題為前提。鄉土社會滿足了這前提，因之它的秩序可以禮來維持。”這就是費孝通所說的中国社會是“禮治社會”，是“禮治秩序”。正因為鄉土中國的人習慣于禮治，所以在法律上是“無訟”，在政治上是“無為”，而受着“長老統治”。費孝通所說的中国社會結構，是一個以人倫為本位，以親屬關係為基礎的社會，它的輪廓大致如此。

費孝通說起了社會結構之外，還說起了經濟結構。他說中國的經濟是一種“匱乏經濟”。他從禮治社會中拈出了“知足、安分、克己”幾個觀念來，說這幾個觀念是和“匱乏經濟”相配合的，即是說禮治社會是和匱乏經濟相配合的。他說：“中國是個農業國家。中國人民的生活多少是直接用人力取給于土地的。土地經濟中的報酬遞減原則限制中國資源的供給。其次，我們可耕地的面積受着地理的限制。這個舊世界是一個匱乏的世界，多的是人，少的是資源。馬爾薩斯的人口論似乎最適合于中國的情勢了。”中國的經濟為什麼是那麼樣匱乏呢？依據費孝通的理解，這是和儒家思想的“知足、安分、克己”等觀念有關係的。因為禮治社會中的人習慣于“知足、安分、克己”，所以不向自然界去爭取，因而科學技術不發達。科學技術不發達，在人多資源少的國家，其經濟更趨于匱乏。所以他說：“中國傳統文化中不發生科學，決不是中國人心思不靈，手脚不巧，而是中國的匱乏經濟和儒家知足的教條配上了，使

我們不去注重人和自然間的問題，而去注重人和人間的位育問題了。”這就是說，經濟的匱乏，是由于人多資源少，又因為受了儒家知足的教條的限制，不能發展科學和技術，向外開辟資源，以致人愈多資源愈少。這種“惡性循環”，只有由馬爾薩斯人口論所提供的方法來解決了。

以上是費孝通的中國社會結構論和經濟結構論。現在再說一說他關於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比較觀。

費孝通認為中國儒家思想所培養出來的“知足、克己”的精神，是和中國的傳統匱乏的經濟相配合的。正因為人們“知足、克己”，所以不向自然界爭取什麼東西，因而科學技術不能發達，不能產生人對自然的新關係。“匱乏經濟因為資源有限，所以在位育方式上是修己以順天，控制自己的欲望以應付有限的資源。”至於西方“基督教傳統所孕育的那種無壓求得的現代精神”，是和西方的富裕經濟相配合的。正因為“無壓求得”，所以要向自然界爭取物資，因而科學技術日趨發達，不斷產生出人對自然的新關係。富裕經濟是“修天以順己，控制自然以應付自己的欲望。”但是據費孝通說，匱乏經濟和富裕經濟各有一種惡性循環。在匱乏經濟中，“勞力愈多，技術愈不發達，技術愈不發達，勞力也愈多。在富裕經濟中也有一種循環：科學愈發達，技術愈進步，技術愈進步，科學也愈發達。到現在至少已有一部分人感覺到，科學發達得太快，技術進步得太快，人類已不知怎樣去利用已有的科學和技術來得和平的生活了”。

依照費孝通的意思說來，由於中國匱乏經濟的惡性循環的存在，所以一經和現代工業國家接觸，中國就變為西洋工業

的市場，變得更为穹困。“在这生产力日降，生活程度日落的处境中，絕不会有‘現代化’的希望”。費孝通在中国这样的处境中，就想出了“乡土重建”的許多办法来，如所謂“現代工业的技术的下乡”、“分散在乡村里的小型工厂”、“乡土工业的新型式”、“自力更生的重建資本”、“節約儲蓄的保証”等等——这些办法就是主張在乡村中举办一些輕工业，为匱乏經濟找寻出路。其次，西方丰裕經濟也因为恶性循环存在，所以引起了第一和第二两次世界战争。这个原因是由于西方还没有“創造出一个和現代技术能配合的完整的社会机构。西方国家只重視人对自然的关系，而在人对人的关系方面却是沒有搞好。在人对人的关系上，中国的傳統却比西方为好。費孝通說：“中国的傳統，固然使我們在近百年来迎合不上世界的新处境……但是虽苦了自己，还没有遺害別人。忽略技术的結果似乎沒有忽略社会結構的弊病为大。若是西方经过了这两次大战而已覺悟到非注意到人和人的关系时，我想也許我們几千年来在这方面的研討和經驗，未始沒有足以用来参考的地方。”他这些話的意思是說，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虽然不行，而中国几千年来傳統的社会結構却比西方的社会結構好，西方国家可以把中国的傳統作为复兴的底子。

以上，我簡要地叙述了費孝通的中国社会結構論，中国經濟結構論、和中西文化比較觀。这三个部分大概是費孝通所說的他自己的“中国社会学”了。現在让我来檢查他的“中国社会学”中这三个部分。

第一，必須指出，費孝通的“中国社会学”中那三个部分，完全是从梁漱溟所写的几本书抄襲得来的。梁漱溟所写的那

几本书是：1921年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35年出版的“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1937年出版的“乡村建设理论”。至于费孝通的“中国社会学”的“理论”，零星地表述在“乡土中国”和“乡土重建”之中，这两本小册子都是在1948年出版的。我们只要把这几本书翻看一下，就知道费孝通是完全抄袭梁漱溟的。费孝通所说的“礼治社会”、“以亲族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和梁漱溟的“伦理本位”的社会完全相同。其次，费孝通所说的“知足、克己、安分”等观念是中国经济匮乏的原因，这和梁漱溟所说的“安分知足、摄生、寡欲”是中国物质文明不发达的原因，也是相同的。不同的地方只有一点，就是费孝通说的中国“人多资源少”的“恶性循环”符合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并且更有甚于它。其三，费孝通所说在乡村里举办“乡土工业”的主张，和梁漱溟所说“凭借农业谋翻身”、“从农业引发工业”的主张，其内容完全相同。其四，梁漱溟说，中国人的意欲的方向是“向里用力”，一切“反求诸己”，所以不向自然界和社会争取什么，因而科学和德谟克拉西不发达；至于近代西洋人的意欲的方向，是“向外用力”，所以要向自然界和社会争取，因而科学和德谟克拉西就发达起来。但期至今日，中国文化要抬头了，西洋人“外面生活虽然富丽，而内心里生活却贫乏至于零”，因此，西洋人不能不走到中国文化的道路来。我们来看，费孝通的中西文化比较观，不是抄袭梁漱溟的么？可是费孝通的抄袭是不够充分的，并且行文晦涩，还使用了一些术语如“匮乏经济”、“价值观念”、“差序格局”之类，使人看了难懂。所以梁漱溟批评他说：“真令我怀疑：究竟写一篇文章所给人的影响，是增加了明白，还是增加了不明白？”梁漱溟是唯心

主义的中國文化史觀的創造者，費孝通是這種史觀的抄襲者。

第二，費孝通和梁漱溟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在立場上梁漱溟代表官僚地主階級，費孝通雖也代表地主階級（他說他是“沒落的地主”），但主要地是代表買辦資產階級。

在理論上費孝通和梁漱溟都用唯心主義的中國歷史觀、社會觀反對馬克思主義的中國歷史觀、社會觀，都否認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梁漱溟主張秦漢以來的中國社會是“倫理本位、職業分途”的社會，沒有階級分裂和階級鬥爭；他認定近百年的社會是倫理本位崩潰中的社會，否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主張，但他也承認帝國侵略是事實，同時承認這種侵略是好的，直言無隱。費孝通却很狡猾，只說孔子以來的中國社會是“禮治社會”，是以親屬關係為基礎的社會，故意抹煞中國社會歷史中階級的對抗和鬥爭的事實，故意抹煞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

在政治上，他們兩人都擁護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反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梁漱溟反共反人民是公開的，不但有言論，而且有行動（在鄧平搞的那一套村治主義運動）。費孝通反共反人民却是暗射的，他只是宣傳他的“禮治社會論”和“匱乏經濟論”。當1948年全國解放前夕，解放區正在大規模地進行土地改革時，他却為地主階級策劃，恐嚇農民不要奪取土地，以免遭到破壞，引起外來勢力的壓迫，同時勸地主趕快向工業方面轉移，用資本特權代替土地特權。這一套計劃顯然是和共產黨的政策相對抗的。並且，當時美帝用軍隊和軍火幫助蔣介石匪幫搞反革命內戰的時候，費孝通卻說杜魯門主義只是一種

对外不侵略的門罗主义，同时还誣蔑我們的解放战争是自相殘杀。費孝通在全国解放前夕的这些言論完全是反动的。

三

現在，我們来檢查費孝通的社会調查。

費孝通說，他做的社会調查工作分为两步，第一步是“在一定时空坐落中去描画出一地方人民所賴以生存的社会結構”，第二步是“比較不同社区的社会結構”，借以作出社会結構論。可是費孝通的中国社会結構論，是从梁漱溟那儿偷窃得来的，和他的社会調查全无关系。这样說来，只有社会調查这一部分算是他自己的东西了。

費孝通在抗日战争以前，在他的家乡江村做过一次調查，用英文写成了“Peasant Life in China”(中国农民生活)一书，在英国出版。这本书是写給英国人看的。这书的内容，有楊成志教授批判过。抗日战争发生以后，他得到中英庚子賠款的資助，在云南农村調查过一次，写成了一本“綠村农田”，后来把它帶到美国去，写成英文在美国出版，这是写給美国人看的。也許，他在全国解放以前还搞过一些什么調查，我們无须为他写的社会調查列成目录，单拿他今年(1957年)所写的“重訪江村”作个檢查的对象，也可以看出他所应用的社会調查的方法和調查的目的。

依据夏康农同志在“一株毒草的解剖”(見“新观察”1957年第15期)中所揭露的，費孝通是功能学派头子馬凌諾斯基的門徒。馬凌諾斯基自己說，他們的調查研究工作的任务，“不在于闡明这些或那些制度的起源和历史，而在于指出它們